

第一章

思潮與社會條件  
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個例子

新文化運動有兩個層面，一層是破的，一面是立的。在「破」的方面，可以一言以蔽之，即「去傳統化」；「立」的方面，在思想上是提倡民主、科學、平等、女權等新價值、新觀念，學術上則是在「科學」的大纛下，每一種學問都起了根本的變化，有了新的發展，一九二〇年代以後逐步建立了新學術社會。

本文所要討論的並不是「破」的方面或「立」的方面的思想內容，而是想討論「新」、「舊」遞嬗中，社會政治條件所發生的類似火車「轉軸器」般的作用。這個問題牽涉的範圍非常之廣，本文只選擇了兩個例子加以討論：第一個例子偏重在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背景方面，以陳獨秀和《新青年》的變化為主；第二個例子則是一個地區型人物的變化，我所舉的是四川成都的吳虞。把它們放在一起討論，除了方便人手之外，也是想看看全國性的舞台與地區型知識分子之間的互動。

一

傳統思想及倫理綱常至少有四個重要的建制性的憑藉：科舉、法律、禮儀及皇權，它們在二十世紀初次第倒台，使得原來緊緊依託於它們的傳統思想與綱常倫理頓失所依，從而也使一個廣大的群眾隨着它們的消逝而茫然失措。

科舉是一九〇五年廢除的。這是當時驚天動地的大事。科舉制度原來是舉國知識菁英，與國家功令及傳統價值體系相聯繫的大動脈，切斷這條大動脈，則從此兩者變得毫不相干，國家與知識大眾成為兩個不相繫聯的陸塊，各自漂浮。社會上也出現了大批的「自由流動資源」(Free floating resources)，他們為了維持社會菁英的地位，不能再倚賴行之一千多年的這條大動脈，而須另謀他途。它一方面使得吟哦四書五經、牢守功令、恪遵倫理綱常的舊菁英頓時失去憑藉，同時也逼使這些漂浮流動的人才面向許許多多新的選擇、新的前途。

廢科舉也使得八股文失去了「再生產」的憑藉，為一種新的文學運動清除了道路障礙。如果不是廢科舉使得舊式文章不再與功名利祿連在一起，則白話文不可能得到那麼快、那麼大的成功。而廢科舉與甲午及庚子兩次戰爭的失敗當然有關，所以提過考籃得過

功名的陳獨秀（一八七九—一九四二）回憶說：「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，至今猶在八股垂髮時代」。<sup>1</sup> 胡適（一八九一—一九六二）也觀察道：「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存在，白話文學的運動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」。<sup>2</sup> 如果科舉制度還在，古文與墨義仍是名利的敲門磚，則中國的讀書人仍然要「鑽在那墨卷古文堆裏過日子，永遠不知道時文古文之外還有什麼活的文學」。<sup>3</sup>

傳統思想與禮教綱常的另一個憑藉是法律。在清代，《大清律例》當然是規範人們行為最為重要的法典，所謂「無一條非孔子之道」的《大清律例》<sup>4</sup> 在清廷的最後幾年改修，出現大幅模仿西方的《大清新刑律》（草案）。到了民國元年，維護禮教綱常的《大清律例》被具有平等精神的《新刑律》所取代，為行為的解放開闢了一個廣大的空間。

除上述所列之外，辛亥革命結束了君主政權，也使得禮儀、文化與之俱變。祭孔典禮是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教育總長蔡元培（一八六八—一九四〇）廢除的，同時，蔡元培也以政治力量廢除學校讀經。以上幾種變化，當然都有長遠的思想背景，最終在建制的層面上落實，但它們也回過來加速「新」、「舊」思潮的變換。思潮與社會政治條件之間，殆有如火車和「轉軸器」般的關聯。

民國元年以後的幾個政治事件，尤其是舊文化勢力的回流、袁世凱（一八五九—一九一六）稱帝以及張勳（一八五四—一九二三）復辟事件，也發揮了「轉轍器」的功能。它們逼出了一種深刻的心理變化，使得晚清以來批判傳統與引介新事物的軌道有了微妙的改變，它們使得新文化運動能擴大它在新知識分子中的影響，說服了一些持不同意見或遲疑的人。因為這些政治社會事件，與新文化運動有密切的機緣因果關係，所以會有人在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說：「近兩年裏，為着昏亂政治的反響，種下了一個根本大改造的萌芽」。<sup>5</sup>不過，我必須聲明，我決不是想談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，也決非否定在一個長時段的思想發展中，存在着內在的邏輯。

任何有關新文化運動的討論都不能省略《新青年》。《新青年》是近代思想發展的一面鏡子，它的變化非常快，幾乎每一卷都有新的重心。在「五四」之前，它的發展大約可以分為幾個階段。一開始，它強調「青年文化」，同時也介紹各國的青年文化，這與刊物的名稱相符。第二個階段則刻意批評孔教與軍閥因緣為用，並抨擊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的不合。第三個階段提出倫理革命及文學革命。而第四個階段則強調思想革命，認為文學本和文學工具與思想而成，在改變文學的工具之外，還應該改換思想。<sup>6</sup>在「五四」前後，

《新青年》中社會主義的成分愈來愈濃，一九一九年五月的「馬克思主義專號」即是一個例證。一九二一年以後，《新青年》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「機關報」。

《新青年》不停地變，新知識分子卻不一定能贊同它每一階段的主張。譬如南社領袖柳亞子（一八八七—一九五八），他贊同攻駁孔教，但不同意胡適的文學革命。<sup>7</sup>又如胡適，他提倡文學革命，卻未必贊同《新青年》往社會主義方面發展；而能同意其討論社會主義的，也不一定同意它成為共產主義的喉舌。所以《新青年》像一部急駛的列車，不斷地有人上車，不斷地有乘客下車，能共乘前一段路的，不一定能共乘後一段路。

與我們這裏所要討論較相關的，是第二、第三及第四階段。事實上，《青年》創刊之初，連贈送、交換在內只印一千份；使《新青年》銷量漸增的是宣揚倫理革命的階段，尤其在胡適加入以後，文學革命成為討論的主題；以及一九一七年該刊編輯組遷到北京，北大批新教授加入筆陣之後。它的銷量最高達一萬五、六千份。<sup>8</sup>

陳獨秀與陸續加入的幾位新文化運動領袖，都與辛亥革命有關，而他們也都牢守民主共和的理想。

從甲午到辛亥，中國思想界經歷兩大階段。甲午戰爭失敗後，舉國上層及中層社會大夢初醒，泰半認為雖聖人亦不廢富強之策，康有為、梁啟超乃提倡變法。而新舊之爭激

烈，舊派走向極端，乃有庚子義和團之亂；經過這次變亂而舊派頓失所依，新派大行。然而康、梁所提倡的改革意見，基本上集中在「行政制度問題」上，而對於政治之根本問題，距離尚遠。清末革命、立憲兩派則辯論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，開始接觸到政治的根本問題。辛亥革命成功，使得民主共和的主張得到落實。<sup>9</sup>

這個民主共和的新政體，用體制性的力量，公佈了許多合於西方潮流的政策。在一九一二年的最初三個月間，先後發佈了三十幾通除舊佈新的文告，它們大多是辛亥革命前二年間，革命黨人宣傳過的主張，此時則以法令、政策的形式頒行全國。而其中最震動人心的是，教育總長蔡元培所宣佈的停止祭孔，中小學廢止讀經和北京大學廢除經科正式命名為文科。周作人（一八八五—一九六八）說：「這兩件事在中國的影響極大，是絕不可估計得太低的。」當時即有人以「毀孔子廟罷其祀」形容之。<sup>10</sup>一九一二年四月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，新思想與新事物失去它在政治上的依靠。這年年底，新文化退潮，而舊文化回流，從中央到地方，新舊兩股政治勢力和文化勢力的鬥爭與歧異，始終是存在的。舊文化的回潮也有政治力量作後盾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，尊孔讀經之論，從廣東、山西等地蔓延開來，山西有「宗聖會」，北京有「孔社」，青島有「尊孔文社」，揚州有「尊孔崇道會」，鎮江有「尊孔會」。在蔡元培辭去教育總長後，教育部隨即公佈了孔子誕辰

紀念日，許多地方紛紛組織慶祝「聖誕」之活動。一九一三年，江蘇都督張勳的根據地南京的文化復古風氣極盛。這年二月，張勳〈上大總統請尊孔教書〉，孔教會領導人物集會上海發起孔教會，以昌明孔孟、救濟社會為宗旨。六月二十二日，袁世凱發佈「尊崇孔聖令」，說「至悍然倡為廢祀之說，此不獨無以識孔學之精微，即於平等自由之真相，亦未有當也。……以不服從為平等，以無忌憚為自由。」八、九月間，孔教會總部遷到北京，宣傳只要孔教一昌，當時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可一併解決，政局也可以安定下來。一九一四年是舊文化全面擴張並進一步政治化之時。這年年初，北京「孔社」舉辦「信古傳習所」，所習科目以經學為首；北京也有人組成「庚子拜經會」，認為想救國族必自拜經始。四月間，有三十餘人向政治會議提出設立經學館議案，要求將五經流佈歐美。此年秋季，袁世凱親赴孔廟祭孔，行三跪九叩禮。這年冬至，袁世凱着古裝在天壇舉行民國首次盛大祭禮，各地文武大員紛紛仿行。一九一五年，全面推行教育復舊、小學讀經。同時出現小學將廢、科舉將復的謠言。除此之外，在這幾年間，壓抑女權的風氣亦隨之而起。禁止女子參政，禁止女子加入政治結社、或加入政壇集會。一九一三年〈治安警察條例〉禁止男女自由交往，褒揚貞節烈女的風潮勃起，一九一四年三月，袁世凱頒佈條例，管制戲園，禁止男女合演。同時宗教力量逐漸復甦，毀學興廟之風開始興盛。<sup>11</sup> 在這波文化風潮中，袁

世凱稱帝的活動開始登場。一九一五年八月上旬，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率先發表〈共和與君主論〉，主張實行君主制。接着日本人有賀長雄亦發表〈共和憲法持久策〉，為袁氏稱帝製造輿論，楊度（一八七五—一九三一）等人組成的「籌安會」與之呼應。籌安會通電各省軍政大員派代表到北京，組織公民請願團；而袁的各地親信也上書勸進，請其「速正大位」。

在所有文化復古運動中，最令人矚目的是風起雲湧的、在憲法中明定孔教為國教的運動。袁世凱表面上雖然對國教不置可否，但不斷地以言論和實際行動加以支持，後來，《天壇憲法草案》第十九條也附上了尊孔的條文。

就在推動袁氏稱帝的聲浪中，陳獨秀創刊了《新青年》，這個時間上的順序不能算是偶然。研究陳氏的人不能忘記他在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中的角色，以及他是個共和政體的信仰者，而袁世凱復辟活動則促使這個革命家猛醒。在當時人的各種回憶中還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。以錢玄同（一八八七—一九三九）為例，他說洪憲紀元像霹靂一聲驚醒他迷古的美夢：

若玄同者，於新學問、新智識，一點也沒有；自從十二歲起到二十九歲，東撞西摸，以盤為日，以康瓠為周鼎，以瓦釜為黃鐘，發昏做夢者整整十八年。自洪憲紀元，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，始知國粹之萬不可保存，糞之萬不可不排泄：願我可愛可敬的支那青年做二十世紀的文明人，做中華民國的新國民。<sup>12</sup>

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畫出了一個民主共和國的畫餅之後，緊接着是一連串因對比而形成的失望，而失望與希望的力量至少是一樣大的。新思想家們敏感地認為中華民國是「一團矛盾」，對於在共和國體之下實際上卻是專制政治一事實大感奇怪。<sup>13</sup> 陳獨秀說：

吾人果欲於政治上採用共和立憲制，復欲於倫理上保守網常階級制，以收新舊調和之效，自家衝撞，此絕對不可能之事。蓋共和立憲制，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，與網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，存其一必廢其一……<sup>14</sup>